

一代軍師劉伯溫的困境與心靈超越－ 以劉基《鬱離子》為例

黃崇修(光仗)

天人文化院提供

摘 要

根據本文研究結果，我們發現到《鬱離子》中反應了劉基本人以他自身的生命，經歷「怒鬱」到「憂鬱」的過程，而其更將這些走過的過程，藉由寓言故事，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除此之外，他超越了身體場域的侷限，將其關懷觸角延伸到女性人權問題上。因而原本只是夫婦間的家庭小事，卻也可在其書中被反應為禮教文化與政治、社會活動間，糾纏不清的哲學性課題。《鬱離子》的出現，正是為這樣問題產生，試啼先聲。

另外，目前雖然還無法證明劉基受朱丹溪鬱說影響而有此《鬱離子》之作。但就劉基對氣鬱、心疴等醫學概念之使用，足以說明劉基與朱丹溪同時感受到當時社會普遍存在之鬱之問題。尤其劉基在書中反對朱子「婦人七出」之說及「寡婦營」之策，正也反映出劉基對於欲望與禮法間之衝突問題與朱丹溪之理論有共同之關懷。

或許由此亦可看出，兩者之觀點突顯出了隸屬於強調事功的永嘉學派之劉基，與參和著金華呂祖謙學術思想的朱丹溪，共同地對南宋以來朱子禮學之盛行之一種反思。這種反思雖然各自以醫學及文學之方式表達，但是兩者所呈現對朱子學中「天理人欲」之過度強調所造成之社會問題之關懷，正也反映出當時社會接納朱子理學後，對於所謂憂鬱病之產生有推波助瀾之可能。

然而即便劉基與朱丹溪皆反省到政治文化上之禮法與人類本能慾望之間的確存在著矛盾衝突。但兩位士人並非因這種矛盾衝突的出現而斷然否定禮法存在之重要性，亦即他們瞭解到合理的慾望順遂可以「文明昌盛」，而不合理的慾望壓制則會造成「鬱病」的產生。這個合理性就是他們所追求的「合乎人性的禮」。因此「鬱離」與「欲禮」該如何合理調適而致中和，這便牽涉到儒家或道家所提倡的工夫論問題了。

關鍵詞：劉基 鬱 慾望 禮 醫學 朱丹溪

一代軍師劉伯溫的困境與心靈超越－ 以劉基《鬱離子》為例

黃崇修(光伏)

筆者嘗試性地以身體論述為切入點，而對「欲」與「禮」之儒學課題作了一次不同角度之解析。藉由此項哲學性之分析，其對於顯明本人研究朱丹溪在儒學思想發展上之貢獻及地位，多少提供了一些拋磚引玉之效果。然而，此項縱軸式之研究雖然對於掌握儒學式的鬱說理論有所助益，但對於道家式的鬱說理論之闡揚則無跡可尋。因而本文將在「鬱」之主題下，除了針對朱丹溪學派鬱說開始盛行時，對於當時人文社會所產生的回響作初步之考證，以期助益學者進一步掌握其鬱說興起的時代背景，及承先啟後的關係之外，對於當時受道家影響而針對「鬱」的問題提出見解的道家士人的理論亦有待進一步探討。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之下，筆者發現到其中不論在時間、地緣、思想結構、社會關係上都與朱丹溪學派有著微妙關係的劉基這位名人之重要性。尤其其著作《鬱離子》的問世，不但可相應於本研究「鬱」之探討主題，其書名《鬱離子》所帶有的特殊含意，與朱丹溪所關注之「欲」與「禮」之課題，皆在讀音與義理上有偶然之必然相似性。對於此種微妙之思想交會之出現，其是否意味著當時士人對「鬱」的問題已有著共同的關懷及感觸，這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當然《鬱離子》的出現究竟能夠提供了我們怎樣的線索及視野，讓我們在醫學論說之外也能實際掌握當時鬱之現象的幾種面貌，這也是本文所關注之處。

壹、劉基事蹟考析

一、劉基生平

關於劉基的事蹟主要見於〈誠意伯劉公行狀〉（黃伯生、1383）、《明太祖實錄·劉基傳》（卷九九、王景編、1399）、《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張時徹撰）、《翊運錄》（劉薦編書成於永樂中）、〈明史·劉基傳〉（卷一二八、張廷玉等編 1739）以及其相關著作的序文記載中。

根據楊訥先生最新的考據文獻顯示：與劉基相關的官方文獻基本上主要是依據〈行狀〉內容而增補發揮而成的。因此，照理說〈行狀〉中的記載可說是了解劉基生平第一

手文獻。然就楊訥先生在其《劉基事蹟考述》中認為；〈行狀〉記載內容多處與史實不合，且有避重就輕之嫌。故楊氏推想〈行狀〉可能是劉基之子仲璉（或孫子劉薦）擬文之後，因礙於親族的身份問題而託名黃伯生以為〈行狀〉之作者¹。

因此本文于介紹劉基事蹟時，雖仍然引用了〈行狀〉、〈明太祖實錄·劉基傳〉、《翊運錄》、〈明史·劉基傳〉等文獻，但這僅是作為瞭解劉基真實遭遇時，佐證本研究的對照性資料，而不代表其記述的絕對客觀性。

首先根據〈行狀〉記載：

公諱基，字伯溫，世為處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性理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不報于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²

劉基於至順三年（1332）二十二歲中舉人、隔年中進士，三年後於江西高安縣開始他的政治生涯。然而在其仕元期間，雖躊躇滿志，卻因其坦率剛直，嫉惡如仇的個性，得罪了當時的權臣，因此遭遇到幾次罷官的命運。而其中羈管紹興的事件（1353）及後來履建戰功而不錄的事件（1358），則成為歷史評斷劉基仕元期間受小人誣陷、憂憤不平的主要根據。

關於這些事件緣由，茲引用《明史·劉基傳》的說法以為討論。首先就羈管紹興的記載，其大致內容如下：

方國珍起海上，掠郡縣。有司不能制，行省復辟基為元帥府都事。基議築慶元諸城以逼賊，國珍氣沮。及左丞托里特穆爾招諭國珍，基言方氏兄弟首亂，不誅無以懲後。國珍懼，厚賂基，基不受。國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遂詔撫，國珍授以官，而責基擅威福，羈管紹興，方氏遂愈橫。³

另外，同書關於劉基棄官歸里的記載如下所示：

¹ 故唯有成化版〈行狀〉的文末載有黃伯生的署名，而於嘉靖本及隆慶本則被刪除而不載。參見楊訥《劉基事蹟考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P179。

² 參見黃伯生〈故誠意伯劉公行狀〉。另外《明史·劉基傳》亦提到「西蜀趙天澤論江左人物，首稱基，以為諸葛孔明儔也」參見張廷玉等編《明史·劉基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739）卷一二八。

³ 張廷玉等編《明史·劉基傳》同上書。

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李國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於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時從義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鬱離子。

由此正史記載看來，當時史家還是相信劉基於仕元期間是非常不順而憂鬱的。因此這也就自然形成後人對《鬱離子》著作背景的一種基本認知。然而就楊訥先生對劉基元末事蹟考查的結果顯示，劉基被「羈管紹興」以及「軍功不錄，憂憤成疾」的說法純屬虛構而與事實不符⁴。至於這個觀點是否正確，非本人治史能力所及。本節暫且接受歷史中官方文獻的說法而保留楊訥之說，並於下節中借《鬱離子》的研究過程去釐清這之間曖昧而不明之處。

二、《鬱離子》出版年代考證

關於《鬱離子》的版本主要有明刻版和清光緒年間的《子書百家》本⁵。目前所刊行之單行本，主要來自此兩版本而出。根據洪武十九年徐一夔為《鬱離子》所寫的序文所示：「其書總為十卷，分為十八章，散為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己、慎微、修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概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

由此可知，當時的編排分為十八章，而有一百九十五條。至於為什麼是一百九十五條呢？因為《鬱離子》乃是以寓言的文體成書，故有條目之分。然而當初所記載的一百九十五條，經過了明代幾次重編的過程，最後演變成目前一百八十一條寓言。至於為何會有如此的遺漏呢？其緣由有待進一步考證，此處暫不討論⁶。

即便如此，就以目前一百八十一條寓言的字數來算的話，其文字總數至少有四萬字以上。然而這個數字卻與早期王禕⁷寫給劉基的詩中的記載內容有所出入。其詩中提到：

慨嘆將何為，怨言啟茅塞。先生括蒼彥，長髯漆光黑。平生守勁節，枉直尋瓷尺。
著書三萬言，石室豈寥寂。還攜青藜杖，來作珠履客。不才托末契，承訓庶朝夕。

⁴ 參見楊訥《劉基事蹟考述》同上書p58-68。

⁵ 根據王立群的考察，《郁離子》的版本，明初已有龍泉章氏刻本，但未見諸家著錄。除此之外，明刻本還有：一、成化六年（公元一四七〇年）刊《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本，分十八篇，篇篇有目，此本訛脫最少；二、正德十四年（公元一五一九年）依成化本重刻《誠意伯文公文集》本，二者基本相同；三、嘉靖三十五年（公元一五五六年）樊氏《重編誠意伯文集》本；四、嘉靖年間刻《郁離子》單行本，分上下二卷，篇目與成化本同，但不知據何本翻刻，此本錯字不多；五、隆慶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依嘉靖本翻刻的《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本，《四部叢刊》影印。明代五種刻本，實際上只有兩個系統，即成化本和嘉靖本。成化本最早，也最精。王立群《尋找理想國—劉伯溫政治寓言集：「郁離子」白話版》（遠流出版社，1994）

⁶ 雖然那些增補的文章有幾篇無法確知，但若以一千字來大略估計的話，洪武十八年期間其出版的《鬱離子》至少增列了十條寓言進去。

⁷ 王禕（1322—1373），明文學家、史學家。字子充，義烏（屬今浙江）人。元末隱居青岩山，明初徵為中書省掾史，與宋濂同修《元史》成，官翰林待制。後因招降雲南梁王受害。諡忠文公。

根據詩中提到「來作珠履⁹客」來看。其中「來作珠履客」所指的就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王禕與劉基同時在禮賢館擔任朱元璋門客時的事蹟。而此時正也是王禕為《鬱離子》寫序的同一年。由於在此之前除了《鬱離子》之外，劉基寫的著作主要是詩詞而並無其他著書。因此可以確知文中提到的「著書三萬言」講的就是《鬱離子》這本書。且藉此詩文內容我們亦可斷定，《鬱離子》於至正二十三年前的確已經問世。所以若根據〈行狀〉、《明史·劉基傳》記載劉基於至正十八年(1358)辭官入青田而著書的說法，《鬱離子》應在至正十八年(1358)至正二十三年(1363)之間成書的。

因此，由當時劉基拿給王禕寫序的《鬱離子》原本三萬的字數，與洪武十八年(1385)由徐一夔(1319-1399)¹⁰為《鬱離子》寫的序文中內文的推算出的四萬字數來比較的話，這之間出現了一萬字左右的差距。至於為何有此字數之差距呢？筆者發現到吳淡如女士及車行健先生的新論點或許可以提供一些線索。

根據吳淡如在其論文對《鬱離子》內容之分析，其舉出「枸櫞」「鴟鵂噪虎」「韓非為政」等文之內容，說明現代版《鬱離子》乃是由元代延續到明代的作品集¹¹。而車行健先生亦認同此說法的可能性。然鑑於吳氏立據仍嫌不足，於是車行健另外再提出〈論相〉這條寓言，說明劉基於元代地方小官的身份，不可能對當朝宰相有評論建言之舉，所以車氏認為這篇文章應為劉基入明之後對朱元璋用相時的建議，從而其依此論證劉基於入明之後仍繼續寫作《鬱離子》¹²。

根據前兩位學者的發現，筆者亦提出一例以為佐證。在〈用賢篇〉¹³中，劉基以伊尹輔左商湯得天下之後，仍心繫於人民而不怠的例子。不似仕元時期的現實情況，反而像是隱喻其輔助朱元璋統一天下之後，仍心繫蒼黎疾苦為己志之心。而這份心思卻因其死前二、三年受到朱元璋的降罪及奸人的陷害，使得其必須罷官歸鄉而無法福澤人民而轉成鬱鬱寡歡的情緒。

故其文末提到「鬱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的結語，不像至正十八年(48歲)時，對元朝徹底失望而待王者興的心境。而此正是〈明史〉所記載般「還隱山中，惟飲酒弈

⁸ 參見《王忠文公文集》卷一。

⁹ 唐張繼《春申君詞》：「當時珠履三千客，趙使懷慚不敢言。」「珠履」即是門客之意。

¹⁰ 徐一夔(1319—1399)，字惟精，又字大章，號始豐，出生於天臺屯橋東徐村一戶貧農家庭。自少學文，師事儒醫胡德完，聰穎善悟，因科場屢試不第，轉而「探求古人之道」。吳元年(1367)，朱元璋平兩浙後，開設「誥局」於金陵天界寺。中書省奉旨薦舉楊維禎、梁寅、徐一夔等博古通今之士編纂禮書，洪武三年(1370)，撰成了《大明集禮》。後來友人王偉又推薦他續修元史，因患腳病，堅辭不往。洪武五年九月，一夔薦授杭州教授。試職期間，育才有方，生徒雲集。翌年九月，詔令翰林學士宋濂、吏部尚書詹同等為總裁，修纂《大明日曆》，一夔參與其事。

¹¹ 吳淡如《鬱離子寓言研究》(台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89)

¹² 車行健〈劉基《鬱離子》探論〉收錄於《書目季刊》三十一卷、四期、P33。

¹³ 參見《鬱離子》用賢篇。

棋，口不言功...其韜跡如此（注：洪武五年）」的心境寫照。因此，除了筆者先前提出的版本字數上的差異問題之外，再就《鬱離子》的文章內容與歷史事件間的比對結果來看，劉基於入明後繼續寫作《鬱離子》應該是可以確定的。

不過根據吳從善「故御史中丞龍泉章公雖已刊置鄉塾，然未盛行於世。」中的記載，《鬱離子》於龍泉章公¹⁴（章溢）死前（洪武元年 1369）已經刊置鄉塾，以及徐一夔《鬱離子》的序文內容提到的「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¹⁵的時間點（1367 至 1370 之間）來看，劉基出示給徐一夔看的《鬱離子》仍然為舊時版本（於青田山時所著者）。于是吾人可知，劉基入明之後所寫的新寓言內容，在其生前（洪武八年 1375 以前）並未被刊出，直至其死後，方由劉璉等的編輯整理，而有洪武十八年的新版《鬱離子》。

至於為何在此新版《鬱離子》中，王禕《鬱離子》序文被抽離掉，而換成徐一夔、吳從善的序文呢？這是本文下一階段所要處理的問題。

三、《鬱離子》洪武版中序文內容芻議

雖說徐一夔、吳從善等人之文才及人格是被肯定。但就王禕與劉基交友甚密，且其於洪武三年受朱元璋之命以特使身份，入雲南險境以招降梁王而死於雲南之事來看，其精神以及事蹟廣受世人稱頌而更無疑義的。因此，於人格及才氣上，王禕並不亞於徐一夔、吳從善二人。因此劉璉等人將王禕的序文抽離掉應該另有原因。至於其理由何在呢？茲就王禕的《鬱離子》序作進一步探討。

先生是書雖寓言居多，然其于天地、陰陽、性命、道德、世運、政治、禮樂、法度之際詳矣。...遭世亂，益韜晦不苟出，雖出不苟就也。用是人尊信之，以為有道之君子。¹⁶

由此內容中可以清楚看出《鬱離子》乃屬記載「天地、陰陽、性命、道德、世運、政治、禮樂、法度」等多元內容的寓言書。且就其分類及語氣上而言，基本上，其內容應該如大學問家的氣勢般，顯像出積極建言而落落大方才是。然而觀看洪武版的内容，則其書中卻不免帶有幾分無奈而無力的感嘆氣氛。

¹⁴ 章溢（公元 1314-1369），字三益，浙江龍泉人。章溢（1314—1369），明初大臣。浙江龍泉人，字三益，號匡山居士。朱元璋取處州後，與劉基、宋濂、葉琛受聘重用。官至御史中丞兼贊善大夫。後因母喪守制，不久病死。

¹⁵ 序文提到：「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環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為之序。」此處「謁公金陵官寺」指的就是，徐一夔於洪武元年(1367)至三年(1370)間，應中書省之薦舉，由杭州上京，並於金陵天界寺，與楊維禎、梁寅、等共同編纂禮書而撰成《大明集禮》之時間點。

¹⁶ 參見《王忠文公文集》卷七。

就筆者大略計算，書中每條寓言中有為數不少提到「憂」「鬱」「心瘳」「悲」「忤」等自我情緒鬱結的消極悲觀語詞。筆者若將此文章內容與王禕的敘述內容比較的話，不得不令人感到懷疑，此中是否有意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之下，讓我們再來看看以下兩個序文內容。

鬱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鬱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鬱離子》...
一變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徐一夔序)

夫鬱鬱，文也；明兩，離也；鬱離者文明之謂也。...從善少嘗受讀，歎其義趣幽蹟，
岐緒浩穰，或引而不發，或指近而歸遠，懵乎莫測其所以然，逮閱之之久，觸類而
求，然後稍得窺夫涯涘。(吳從善序)

由上兩引文中得以發現兩個共同點：

- (一) 兩人的序文中不約而同地為《鬱離子》書名正名，且將「鬱離」解釋為「文昌治盛」的意思。
- (二) 就是無論徐一夔、吳從善皆於早期讀過《鬱離子》，並表明於閱讀初期無法清楚掌握到其要領。

首先就第一點而論，這樣的舉動雖可理解為書名本身于漢字意義解釋間具有多義的爭議性。但是若果真如此，在王禕的序文中為何沒意識至此而對其隻字不提。由此可知，書名本身的問題並不是那麼大。而最關鍵點可能在於作者的劉基於入明之後的遭遇所產生的聯想。

也就是說，入明之後，劉基可能將其遇而不合之矛盾困窘心情，以寓言的方式表現在《鬱離子》上，以抒發自己不滿的情緒及無奈。而徐、吳二人作為劉基的後學，基於劉基的聲譽或不想坐罪于朱元璋，所以有意識地在此書名上大作文章；希望將這些新編入的明初作品所具有的傷害特質，依著洪武十六年作成的〈行狀〉的說法，暗渡陳倉地將之轉嫁為劉基對元末朝廷的不滿情緒表現。

而這樣的構想雖然設想周到而用心深遠。但是徐、吳二人卻也同時在序文中披露出不可掩飾的矛盾點。因為根據第一點中二人對「鬱離」的解釋來看。如果劉基本人真的只是單方面地將「鬱離」解釋為「文昌治盛」的意思的話，那麼作為一本治世要典而言，應該敘述言簡意賅、論斷條理清晰明瞭才是。而不應該使用了連兩位大學問家都看不太懂，而讀之卻步的隱喻文體。因此徐、吳二人的解釋雖有理可具，然因其刻意忽略劉基的生平遭遇的情況，反而有欲蓋彌彰之嫌。因此，在如此的問題意識下，我們再引用以

下洪武十三年間 葉蕃¹⁷為劉基《寫情集》寫序的內容以為引證：

其經濟之大，則垂諸鬱離子，其詩文之盛，則播為覆瓿集。風流文采英餘，陽春白雪雅調，則發洩於長短句也。或憤其言之不聽，或鬱乎志之弗舒，感四時景物，托風月情懷，皆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寫情集》。

根據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劉誠意基」條所示：「公自編其詩文曰：《覆瓿集》，元季作也；曰《犁眉公集》者，國初作也」¹⁸可知《覆瓿集》乃元季時之作品。對於此作品，葉蕃將之評語為「詩文之盛」，從而知道劉基於元末期間舞文弄墨、神采奕奕的雅緻。反之，入明之後葉蕃對《寫情集》的評語中卻有「憤其言之不聽，或鬱乎志之弗舒」之語。由此可知，劉基入明之後的確是懷有憤鬱不平大志難舒之感慨。如此一來，一般所認為「元末憤鬱」、「明初發達」的記載內容似乎是有待商榷的。

鑑此，我們重新來回顧楊訥先生的新發現。楊訥先生為了證明自己的新論，其以歷史的研究方法，廣泛引用了劉基的詩文、元史、明史、以及明末許重熙、錢謙益等史家的說法，而證明了劉基仕元期間被「羈管紹興」以及「軍功不錄，憂憤成疾」的說法與歷史記載明顯不符合這樣的結論。

由此楊氏的說法若與筆者發現到《鬱離子》序文中刻意隱藏劉基入明之後情緒沈鬱之事來看的話，可以推論出〈行狀〉中刻意捏造出劉基於仕元期間鬱鬱寡歡，而入明之後如何受到朱元璋的禮遇之說法其實是有偏頗的¹⁹。因此，對於這些由劉基後代或當權者刻意編出的歷史假象，有必要審慎客觀地重新看待。

進一步地說，經由對劉基元末明初間的活動事蹟及對《鬱離子》出版過程的考察結果，吾人必須大膽地解構劉基仕元期間憤憤不平而憂憤成疾的既來說法，而重新建構劉基於元末明初的真實遭遇及想法。

以下茲針對《鬱離子》這本書之諸多面像予以重新解讀，以期能夠還原本書所含藏的真實意義。

¹⁷ 關於葉蕃的記述不多，由序文知道，當時其任永嘉儒學訓導一職。

¹⁸ 參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清順治刊本）

¹⁹ 在這樣的事實下，洪武十六年作成的〈行狀〉，其中關於「羈管紹興」以及「軍功不錄，憂憤成疾」與洪武十八年《鬱離子》的重刊及抽離舊序文而放入新序文的動作，便可看作為一個刻意計畫的結果。由此看來，毛奇齡《西河文集》〈任氏家藏劉誠意扎記卷子書後〉所載：「基避越之前，因徵海喪師，遂自投劾去，挈家避越。」之說反而更屬史實。且這樣的記載足以說明劉基於《潛溪後集序》「予竊痛之，而憂金之將無其人。及待罪居越，得宋君景濂《潛溪集》觀之，…」中提到「待罪居越」之語，並非楊訥先生所認為的，其只是文人一種自嘲的語氣，而實際上是劉基因戰事失敗而自請其罪而辭官的。但〈行狀〉咬緊此句，大做文章之舉，造成了很大的誤解。

貳、《鬱離子》的另一種解讀

由於政治因素的滲入，《鬱離子》的多元面貌已被蒙上了一層濃濃的政治色彩。筆者站在上階段的研究基礎上，以一種脫體制的新思維，去還原本書的原始情境，以期能夠勾勒出其中隱藏的深層意含。至於該如何去解開其中奧義呢？本文以「鬱離」此兩個字著手。

一、《鬱離子》序文中「鬱離」之疑義

關於《鬱離子》書名的定義問題，目前學界並沒有專書特別予以研究討論，而僅素樸地直接採用以下兩位《鬱離子》序文作者的說法：

鬱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鬱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鬱離子》。
（徐一夔序）

夫鬱鬱，文也；明兩，離也；鬱離者文明之謂也。非所以自號，其意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吳從善序）

在此兩引文中，二人不約而同地使用了文字學及易經離卦的說法，而解釋「鬱離」為「文明昌盛」之意。一眼看去這樣的說法義正詞嚴毫無問題。然而令人懷疑的是，吳從善既然如此確信其義所在，為何還要在序文中加上「非所以自號」而加以強調呢？

筆者認為只要稍稍地跳離歷來言說的思考模式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如果將「鬱離」解讀為劉基個人的字號的話，那麼《鬱離子》這本書的主體性則從一種社會國家的抽象目標中，轉移到劉基這個存在的主體。一旦如此，讀者便會自然而然地將焦距擺在劉基身上，從而劉基入明之後被模糊掉的歷史則會再度被勾起而有很多聯想。而這個聯想亦可能會因著劉基的其他著作而發酵。如劉基《覆瓿集》中就有如下的哀嘆。

賈誼奏書哀自哭，屈原心事苦誰論。

經由劉基自比與屈原相同處境之催化，其《鬱離子》就不免地會被擺在與《離騷》相同的框架上。那麼《鬱離子》書名的定義便自然地會與《離騷》聯想在一起了²⁰。而就關於《離騷》的書名定義而言，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釋「騷」為憂，故有「離憂」之解。而班固在《離騷贊序》中釋「離」為「遭遇」故有「遭憂」之說。

因此若根據以上諸解釋；《鬱離子》的「離」就可以解讀為「遭遇」，而「鬱」解釋為「憂鬱」。那麼，「鬱離」便要解讀為「遭遇憂鬱」。一旦如此解讀，《鬱離子》則成為

²⁰ 劉基於《少微唱和集》序中提到：「昔者屈原去楚《離騷》乃作，千載之下，誦其詞而不惻然者，人不知其忠也」。由此也可看出劉基自比屈原之心。

一本如屈原的《離騷》般，記載著忠貞愛國的士人受到當權者冷落之後，於無可奈何之下，藉由寓言抒發自己情感的文學作品了。

而據筆者的考察，這種無奈與懷才不遇之感，的確在劉基《鬱離子》靳尚篇中可以窺知一二。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國王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於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於靳子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甘於口，衣不繇靳子則不安於體，出號令不繇靳子則王心惘然以為不足，臣竊惑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為大忠於王，而不知為王集天下之怒，牧野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亦何益哉？今靳子不鑒往轍，而王蠱是裕。王忱有德令，則靳子收其恩，曰：余實為之。民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利究於下，而怨歸於上。臣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怒，放屈子於湘江之源。屈子去楚，楚乃大弱於秦。

由此內容的解讀便可將《鬱離子》與《離騷》間的呼應關係連結起來了。當然由於《離騷》除了上述的解讀方式之外還有另一種不同的說法，因此「鬱離」的解釋亦可因而隨之而有不同。如王逸在《楚辭章句》中釋「離」為「離別」而將「離騷」二字解釋為「別愁」。如此一來《鬱離子》之於《離騷》之「別愁」，則又可解釋為「遠離憂鬱」之積極性義涵。

若此，《鬱離子》則又具備了積極奮鬥之含意在裡面。即《鬱離子》可視為一劑具有哲學性而警示世人於面對千變萬化之世事中坦然自處而能超離憂鬱的處事良方。而這個解讀方式的確也可以在鷹化為鳩此寓言中看到：

文山之鷹既化為鳩，羽毛、爪觜皆鳩矣。飛翔於林木之間，見群羽族之翬然集也，瞿然忘其身之為鳩也，虺然而鷹鳴焉，群鳥皆翕伏。久之，有鳥翳薄而窺之，見其爪觜、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鬥則爪與觜皆無用，乃竦身入於灌。鳥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鷙也，而化為鳩，則既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由此寓言內容看來，「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這似乎就是劉基本人遭遇到現實困境時的反省結果。經由這個反省他把自己從抑鬱的情境中解放出來，同時他也藉由此書來告誡後人。因此就此角度來看，《鬱離子》的確比起《離騷》的情緒寄託而更具有意義

治療學的意義了。

然而即便如此，對於徐、吳二人而言，將「鬱離」解釋為「遠離憂鬱」，這也是難以接受的。因為只要提到「憂鬱」這個字，當事人擔心其不僅會降低劉基在當時的神聖性，同時也會因為當時文字獄的興盛，其二人不想因此引來朱元璋的注意以及招致自己的殺身之禍。所以將「鬱離」解釋為明朝的「文明昌盛」將是最安全而皆大歡喜之事。

然而，如此帶有政治考量的解釋，並非受到後世學者的全盤接受。如明末方以智在《通雅》中說道：

「鬱釐」。史記：杞文公卒，弟平公鬱立。索隱作鬱釐，引譙周云：「名鬱來」。然則青田之鬱離子本此乎。²¹

方以智根據《史記》中「鬱釐」這號人物的存在，就其讀音上的相近性，而引用譙周的說法，認為「鬱釐」即「鬱來」，而推論「鬱離子」之根源來自於此。亦即「鬱離子」之名即是來自於杞平公鬱釐（前 535 年-前 518 年）。既然如此，為何同一人物卻有「鬱釐」、「鬱來」之不同寫法呢？

索隱²²一作「郁釐」，譙周²³云：名郁來，蓋「鬱」「郁」「釐」「來」並聲相近，遂不同耳。

原因來自「釐」與「來」其讀音相近，所以傳抄上才會有所出入。同樣地「鬱離」的「離」與「釐」的讀音是相似的，因此方以智才有這樣的推論。至於這種從音韻學的角度來解釋字義的方式是否有效，有待專家檢定。但是這種研究方式的確也有值得參考之處。

如近世學者中有人根據《大招》“伏戲《駕辯》，楚《勞商》只”及王逸注“《駕辯》、《勞商》，皆曲名也”，而認為“勞商”與“離騷”均系雙聲字，“離騷”即“勞商”之轉音，因而推論《離騷》本為楚國古樂曲名。若根據這種音韻學的看法，吾人是否也可根據古音，從而推論目前仍保留唐音的閩南語中的「囉唆」是否就是由「離騷」引申而來。

當然這種音韻學的解釋是否客觀正確，事實上還需其它研究方法予以檢證才是。但就目前之討論階段而言，將「鬱離」解釋為來自杞平公「鬱釐」的說法，於文獻根據及思想研究上是很牽強的。因為根據《春秋》或《史記》之記載，杞國只是一個小國，且

²¹ 侯外廬主編《方以智全書》通雅二十、姓名、p690。

²² 唐·司馬貞撰《史記索隱》共三十卷。

²³ 譙周（201—270），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今四川閬中）人。蜀漢地區著名的儒學大師和史學家。史學名著《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即出自他的門下。

因立國於諸強之間，因此常受欺凌而岌岌可危。即便杞國相傳為大禹之後裔而留有夏禮；孔子亦曾問夏禮於杞，但其終究失望而歸。²⁴因此對於一個胸懷大志、負氣甚豪的劉基而言，不大可能選一個小國的君主的名子作為自己的字號。除非方以智看到劉基另一個的面向。那就是《列子·天瑞》中「杞人憂天」的典故。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跚蹠，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由於上述記載之廣泛流傳，「杞人憂天」此成語便在漢字圈裏常常被用來形容庸人自擾的無謂擔憂。吾人若將此「杞人憂天」的概念予以理解在加上方以智的說法的話，則是否又突顯出方以智似乎帶有輕蔑的語氣來看待《鬱離子》的存在。然而如此一來，方以智所指之意就更難以理解了。

因此，筆者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的話或許可以得到不同的解讀。因為「杞人憂天」此語就一般而言雖然不被正面地看待，但也有學者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詮釋；而認為杞國身處列強之間屢經磨難，其國人會有此憂患意識亦屬可取。而這個觀點正也與同文後段《列子·天瑞》長廬子的看法相呼應。

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

「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言之意，正也符合了劉基處于元朝崩壞之憂患情況。因此此時之憂的解讀，則從個人生死的鬱悶情結，轉向了對國家圖存的憂患意識了。如此一來，《鬱離子》一書之解讀又從文學式地情感抒發的擔憂意義，更昇華到了具有儒學式的憂患意識層面了。那麼方以智所提供的這個思考路線說不定是最貼近《鬱離子》

²⁴ 孔子《論語》季氏篇有如下記載：「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的原始精神也說不定²⁵。

當然更有日本學者鈴木敏雄在其翻譯鬱離子日文版時稍稍提及；如果「鬱離」解釋為「鬱來」的話，那麼是否亦可解讀為「紫氣鬱鬱而來」呢？關於此種問法的理由，鈴木氏並未明確提出解釋，筆者亦無法進而評斷。

倒是若從道家的角度來看，在名稱後面冠上個「子」這種方式可說是道家比較常有的作法。因此將鬱離子視為某位高道的名字或是劉基之自號亦是有理可據。然而這樣的思維方式則又將劉基拉向民間傳說中具有預知未來之道教奇人的定位了。而這樣的推論雖然不無可能，但這牽涉到民俗學及到道教範疇，基於篇幅為使討論免於複雜而難解²⁶。故筆者對此先暫且存而不論而待另文再議。

鑑此，本文先就目前所得之分析結果列表如下：

	離（遭遇）	離（告別）	離（文明）
鬱（昌盛）	遭遇昌盛	告別昌盛	文明昌盛
鬱（憂鬱）	遭遇憂鬱	告別憂鬱	文明憂鬱

表中關於「文明昌盛」此傳統的說法已經很多，對此本文將不在贅述。下一節筆者將針對表中「告別憂鬱」所隱含的憂患意識與遭遇憂鬱所隱含的憂鬱情結，以文獻內容解讀的方式作進一步的探討。

二、憂患意識與憂鬱情結

孔子《論語·憲問》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中仁者不憂所指者，依儒家傳統天命靡常思想來看，「不憂」指的不是不憂患，而是不憂慮。然而真的執守憂患意識之餘又該如何避免憂鬱嗎？這是本文想要藉由《鬱離子》的研究，而尋找的答案之一。

（1）、憂患意識

²⁵ 劉基的確於《春秋明經》中有專篇探討杞國的事蹟。請參考〈杞子來朝公子遂帥師入杞〉內容。

²⁶ 於《誠意伯文集》〈菜窩說〉中有犁眉公及東門子的對談比喻。其中犁眉公為劉基本人之別號，而東門子為居於東門的宗侄彬。由此形式看來，劉基喜以別號指稱自己的習慣，故鬱離子亦有可能是指稱其自己而言之。然而居於東門則稱之為東門子的作法正也顯示出鬱離子不一定有道教因素滲入。當然若劉基能如列子最後的結論般「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憂與不憂皆放下而進入道家境界的話，那麼鬱離子的道家傾向亦不能否認。

當我們閱讀《鬱離子》的寓言內容時，可以很清楚地發現到，劉基有一種慣用先秦人物為故事核心的傾向。而這種書寫習慣，除了令人有一種歷史親切性外，更與劉基早期以治春秋起家此事有關。劉基治春秋有年，且將其研究心得表現於《春秋明經》。由此可知，對劉基而言，先秦的經典及歷史、政治之發展應該是掌握的很清楚。

尤其其中強調實用精神、以及作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呂氏春秋》這本書，對於承繼永嘉學派務實學風的劉基而言，多少起了某種思想上的作用(除此之外朱丹溪鬱說之形成亦與此書有關)。而《呂氏春秋·達鬱篇》比劉基《鬱離子》更早地注意到「鬱」的問題。其中內容提到：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污，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蕘。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

值得注意的是，《呂氏春秋》關於鬱的解說中，除了個人之外，其更提出了國家、社會亦有鬱之現象發生。而忠臣之責任便是疏通這個國家與人民間溝通不良所產生的鬱。劉基身為儒者且為官在朝，自然深刻地體驗到這種為人民請命的憂患意識的促動，而不知不覺地將其內化為己身生命模式的基調。

關於這種說法，可以在劉基的《覆瓿集》〈雜詩四十一首〉第二十八首中感受到：

沖霄難為羽，泛海難為舟。縛羊駕戎輅，猛志空悠悠。

農時失耕耨，何以望有秋。決藩盜菽粟，鷹隼不如鳩。

韶華不我與，去若川水流，歲莫獨彷徨，凜凜懷百憂。

由詩中「猛志空悠悠」到「農時失耕耨，何以望有秋」以及「凜凜懷百憂」的表現就可以看出劉基胸懷壯志欲有做為。然卻因小人當道，而有時不我予，憂愁萬千之感嘆。而這樣的心情除了表現在詩句之外，經由「鷹隼不如鳩」這句話，卻也可以令吾人直接連想到《鬱離子·鷹不如鳩》這個寓言含意的隱喻性。

因此，筆者認為，將《鬱離子》內容視為劉基憂患意識的另一種表現，應該是可以確認的。也就是說劉基於仕元期間至隱居青田這段期間，其愛國之憂患意識未嘗因世事變化而有改變。這點可從王禕於至正十八年（1358）為《少微唱和集》序文內容得以確認。其序言中王禕提到：

竊嘆其愛君、憂國、傷世、閔俗之情見于言辭，何其惓惓也。

甚至劉基棄元仕明之後，其愛國愛民之憂患意識更形強烈。此可從洪武元年，劉基甘冒欺君之罪而不懼的「祈雨」事件而得以看出。

洪武元年（1368年）天大旱。八月，朱元璋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處別營，凡數萬人，陰氣鬱結；工匠死骸暴露；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幹和氣。帝納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²⁷

由於劉基認為朱元璋下令戰死士兵的妻子不准改嫁，而必須發送寡婦營，以及工匠死後暴屍在外卻不處理等措施，實有違人性而會造成陰氣鬱結及殘傷和氣。因此劉基藉此大旱求雨的機會，奏請朱元璋改善政策以安民。然而雖朱元璋接受建言而更改正政策，但結果還是大旱未解終而造成了朱元璋的大怒。劉基也因此案，而被削官為民。

由此公案吾人得以看出，劉基力行《呂氏春秋》：「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的道理。而至於「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之說雖不必然錯誤，只是劉基沒有想到「決鬱塞」之後，居然無法得到朱元璋的理解而慘遭罷官。故由此也可以證明，劉基並非楊訥先生所考察一般，是個見風轉舵的投機官僚。而劉基之所以會選擇棄元任明，還是因為他一向以民為本，憂國憂民，所以才有此忍辱負重的選擇²⁸。當然畢竟劉基也是人、也是有情感的，所以他的無奈及抑鬱也只能經由詩文而宣洩了。

（2）明代士人的憂鬱

劉基於明朝成立第一年（洪武元年）便因直言勸諫而得罪朱元璋而遭免職。之後的八年間（洪武八年為止）雖也幾次復職或問事。但也因失去朱元璋的信任或屢遭權臣的陷害而身陷危境。劉基在這段歲月中只能姿態低調而謹慎言行。而如此的委屈求全，更讓晚年的劉基鬱鬱寡歡。所謂詩以言志。他的這些心情都表現在入明之後的作品《犁眉公集》之中。如「憂思浩無際，起坐數更點」以及「勿言愁可量，滄溟未為深」等詩文內容。

對於這類詩文內容的出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劉基這些深遠的憂愁並非因憂慮戰事之慘烈而被引發出的。反而是因為明王朝建立、天下太平之後，面對朝中的厲害關係的鬥爭，所引發出的一種深層的無奈及生死恐懼之心。其於『旅興』五十首之五中言道：

²⁷ 參見《明史·劉基傳》。

²⁸ 因此劉基于仕元期間一直強調華夷之辯以明其志。

傲福非所希，避禍感不慎？富貴實禍樞，寡欲自鮮吝。蔬食可以飽，肥甘乃鋒刃。探珠入龍堂，生死在一瞬。何如坐蓬篚，默默觀大運。文集卷十三

而這些現實的政治鬥爭，令滿懷理想的劉基感到心力憔悴，有願而無力了。所以他也只能含恨愧天，哀嘆時光消逝，人老力衰。

四時迭推移，衰病情所鍾，身羸足以弱，有願不得從，愧負天地生，愴恨填心胸。
秋懷八首之四

甚至最後，劉基在這種身心俱疲、憂患憂鬱交加的情況下，竟使的劉基這位負氣甚高胸懷滿志的士人，有了憂鬱症的自殺傾向而想了斷自己生命以求「死去百患消」。

人生多憂患，死去百患消。但恨不得，無由脫鞵鐮。感春六首之六

而最痛苦的是，他在這種天命意識以及現實磨難掙扎中，連死的權利都沒有，所以他只能在老病之歲月中，枯坐待憂纏。

老病若無歡 坐為憂所纏。文集卷十七五十首之二十

而在本文的第一部份已經分析過，劉基於入明之後仍然繼續書寫《鬱離子》，因此這樣的心情，理所當然地流洩進了《鬱離子》的寓言中。例如其中明顯可以看出為入明之後的作品〈羹藿〉，其中有如下之敘述。

鄭子叔逃寇於野，野人羹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而茹之，弗甘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富而棄其妻、貴而遺其族者，繇遇而殊之也。昔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屨，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非術也，誠之感也。

從「逃寇於野」至「富而棄其妻、貴而遺其族者」最後「論功而未及者」這樣的故事過程來看，這正與朱元璋的在野反元之後，到建立明朝之時遺棄誅殺了當時立下汗馬功勞的大臣。而劉基即便行事謹慎而倖免於難，然因其有仕元的背景因素，故僅被授予「誠意伯」的爵位，而不免會有「論功而未及」之嘆。因此此篇似乎就是劉基暗示朱元璋要誠意感恩不要有過河拆橋的心態，如此才不會造成那些未受獎賞的忠誠的埋怨²⁹。然而即便當時情況是事與願違，劉基也只能默默承受這種孤獨。因此這也造成這篇寓言體中，出現很多代表劉基的郁離子『憂怨悲傷』的情緒。

²⁹ 而實際上，在劉基生前，朱元璋可能根本沒看過這一篇入明之後的寓言，直至洪武十八年後，朱元璋如果在重讀新版《鬱離子》的話，他或許會感觸良深的。

當然面對這樣憂鬱情緒的折磨，劉基畢竟還是企求找到安頓的出路。所以他不僅從文學中找到心情的慰藉，他更積極地跳出這矛盾的現象界中，而開始生起超然無為的道家心境以消解其中的不平。他在《鬱離子》戚之次且中有如下的反省：

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子何為其垂垂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何為其然也？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予哉！戚之次且曰：昔周之姬冶子早喪其父，政屬於家僮，沸用賄，於是家日迫，將改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僮群詢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況於疏遠之人乎？憂之何補，祇自瘳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土矣，是為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為而不憂哉？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為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為其所可為，不為其所不可為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為而自孽哉？

孔子於大道不行的情況下依然可以無往而不自得的行徑，使得劉基反省到一些事物的成敗是自有天數的。能為者則為，不可為者則只能盡人事而聽天命了。逆天而行勉強為之，也只是自找苦吃而已。因此最後劉基的在「梓棘」之辯中，真正進入了莊子的世界，而尋得了自己虛淡清素的安身之道。〈玄豹〉之八

梓謂棘曰：爾何為乎修修而不揚，櫛櫛而無所容，幽樛於灌莽之中，翳朽籜而不見太陽，不已瘳乎？吾幹竦穹崖，梢拂九陽，根入九陰，日月過而留其暉，...」言既，棘倚風而嘯，振條而吟，曰：「美矣哉！吾聞之：『冶容色者侮之招，麗服飾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今子之美，冠群超倫，名彰於時，泰運未開，構廈無入，吾憂子之不得為明堂之棟樑，而翦為黃腸，與腐肉同歸於冥冥之鄉，雖欲見太陽，其可得乎？吾長不盈尋，大不踰指、扶疏屈律，不文不理，天不畀之以材，而賜之以刺，使人不敢樵，禽不敢萃。故雖無子之美，而亦無子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安所求哉？」

由此篇文意看來，劉基已經開始使用道家的虛淡無為之態度面對生活，藉此以期能早日揮掉憂鬱的心情。而這樣心情的轉變，當該與劉基入明之後，開始使用「犁眉公」這個字號所隱含的心情意境有關。

因為「犁眉」這句話除了可以理解為犁眉駒中「良馬」之義，亦可將「犁眉」的「犁」解釋為「劃開」，而有「劃開鎖眉」的意思。因此即便劉基的「犁眉公」稱號有暗示提醒朱元璋自己就是《鬱離子·千里馬》寓言中的良馬，但由於這隻良馬還是因著出身因素而無法受到重用，而最終其也只能藉由自我心境的超越，而劃開其憂患的鎖眉。這是劉基在如此複雜的矛盾下所表現出的人性的極限中無可承受之最大張力。

然而，即便劉基克服了他的心境，但是他卻左右不了他的身體。所以憂鬱在他的《鬱離子》中還是留下了痕跡。以下就醫學的角度，探看劉基的身體與醫學的世界。

叁、劉基《鬱離子》與朱丹溪思想的輝映

由上節，我們知道了劉基是一位懷抱憂患意識，卻於晚年因事不如願而憂鬱成疾的士人。基於此結果，或許有人會問，為何秉持憂患意識的人最後卻罹患憂鬱之疾呢？為了回答這個哲學性的課題，接下來本文將從醫學的角度去探討這個憂患意識與憂鬱間的關係，同時藉由《鬱離子》這本記載著元末士人的思想及憂鬱情緒的典型例子，去瞭解當時的中國醫學界首先提出「鬱病」概念的朱丹溪學派在思想界所造成的影響。

一、帶病之身與醫學之緣

根據劉基寫給宋濂一篇〈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的文章中提到：

予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嘗受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

劉基二十歲的時候便身染疾病而習懶不能事。由此可知，劉基在出道之前就已經身體狀況不佳。至於其中提到的「嬰疾」應該如何解釋呢？若以傳統的解釋的話，一般而言「嬰疾」可以解釋為「患病」之意³⁰。但若深入追問劉基究竟染上何種疾病的話則有待探討。

因此根據劉基的描述，「習懶不能事」可知此病促使劉基之生活懶散而對事無積極性，但若參考宋濂對劉基個性之描述：

負氣甚豪，恆不可一世士，常以倔強書生自命。〈宋文憲公全集〉卷二二〈跋張孟兼文稿續后〉

得知劉基在身體痿弱之下個性卻如此剛強、善惡分明。通常這種情況，於現代醫學而言罹患甲狀腺亢進的可能性很高³¹。尤其這個病又可能會令情緒不穩定而與鬱症有

³⁰ 如《後漢書·黨錮列傳》裏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溷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明 宋濂《淵穎先生碑》：「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耶。」

³¹ 一種內分泌失調的病。通常這種病雖非急症，但若休息不足或疲勞過度，則容易情緒不穩定而易怒，久不治則眼睛突起或脖子腫大。《鬱離子》的〈割癭〉篇中亦有類似病症的記載。

關，因此《行狀》提到：

公發憤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阻之，門人密里沙曰：今是非混淆，豈公自輕溝瀆之時耶？且太夫人在堂，將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氣疾。

以及《明史·劉基傳》：

性剛嫉惡，與物多忤，至是還隱山中。...憂憤疾作。八年三月，帝親制文賜之，遣使護歸。

根據上文中提到，劉基於元末時因事不順遂而開始有痰氣疾，而下文中記載劉基晚年亦因性剛嫉惡，與物多忤，以致憂憤疾作。由此兩文的敘述與劉基對自己身體狀況的說法看來，劉基晚年犯有憂憤之鬱病應該不是空穴來風，而且其病應與其年輕時染此氣鬱之病有關。

有趣的是，由於劉基早年有此慢性病纏身，其對於健康養生之意識也相當注意。職是之故，綜括劉基寫給醫師友人的詩文篇數，與其它文人的文章相較，則有相當比例之差異。

如江仲謙著《醫學錄》時，劉基曾經作序贈之。「家人疾病相連屬不絕。延仲謙診之，投之無不愈，信其為良，稱不虛矣」。另外劉基在文中亦將“良醫之用藥”比之為“良將之用兵”，藥可治病，兵可殺敵。其將“天下之幸”歸因於國家得良將與否。而這樣的比喻，在《鬱離子》多有引用且於〈喻治〉寓言中也有專篇討論。

當然除了江仲謙之外，另外還有〈送醫士賈思誠還浙東二首〉〈贈陳柏光詩序〉〈醫說贈馬復初〉〈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后〉以及〈贈醫士黃元之〉等贈送給醫士之詩文。由此看來，劉基在元末明初之際至少寫有六篇贈予醫師的文章³²。

而另外一件更令人驚訝的是，當時受劉完素·李東垣影響而與朱丹溪共享盛名的滑壽（1304-1386）³³竟然是劉基同母異父的兄長。何以言之？根據記載：

劉基，昆仲有三，長兄名舒，字伯洋，生平不詳；幼弟名陞，字伯演，因戰功，留守陝西，為鎮撫。

其中劉舒的生平記載為不詳。至於為何其兄行跡不明呢？據《紹興府志》記載：

³² 參見林家驥《劉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³³ 滑壽（約1304～1386），字伯仁，晚號櫻寧生，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縣），後遷儀真（今江蘇儀征縣），又遷余姚（今浙江余姚縣）。滑壽自幼聰明好學，善詩文，通經史諸家。先從京口（今江蘇鎮江市）名醫王居中學醫。研讀《素問》、《難經》，頗有心得，遂著成《讀素問抄》和《難經本義》二書。繼之精心研究張仲景、劉守真、李東垣諸家之說，融會貫通，深有造詣。後來又隨東平（今山東東平縣）高洞陽學習針法，遂對經絡悉心研究，取《內經》等書中有關經絡的理論，撰成《十四經發揮》三卷。

葉逢春云：壽蓋劉文成基之兄，易姓名為醫。文成既貴，嘗勸之仕，不應而去。

由此可知，滑壽與劉基姓名不同乃滑壽易姓為醫之故。至於滑壽為何易姓為醫、勸仕而不應的舉動呢？這還要由其性格上來看。首先於《羽庭詩集》中有劉仁本與滑伯仁煉藥的記載：

委羽山中鶴墮翎，老仙為我制頽齡；人無金石千年壽，藥有丹砂九轉靈；候熟鼎爐分水火，所吞朋友走風霜；輕身已得刀圭秘，莫問昌陽與茯苓。

從詩中“丹砂”、“鼎爐”、“輕身”等內容來看，滑壽似乎對於道家的煉丹養生亦有所專精。因此《明史》敘述滑壽：「年七十餘，容色如童孺，行步矯捷，飲酒無算」。而戴良題滑壽像贊曰：

貌不加豐，體不加長，英英奕奕，其學也昌。早啄詩禮之精華，晚探《素》、《難》之窈茫，推其有，足以防世而範俗。出其餘（遺存的學術思想），可以滌臟而滯腸。

34

根據上文之內容之描述，滑壽不但以醫、道聞名于世，其更因具有儒者之風範，故而受到當時文人名士戴良、宋濂、朱右、丁鶴年、宋禧等人的尊敬。也因為這個緣故，滑壽的人品及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劉基的思想也說不定。至少就劉基本人之醫學人脈及滑壽的醫學盛名來看，劉基與醫學所結下之緣份是不可言喻的。而明朝開國之後，劉基與朱丹溪的傳人戴原禮會有較深入之交往，應該也是有跡可循的。

然而雖說劉基與「鬱說」始創者朱丹溪的人脈重疊處很多，但在兩人的文獻紀錄中，並沒有確切的證據說明兩人曾經會晤交談過。而當劉基仕元不順而辭官路過朱丹溪的故鄉義烏時，卻也正逢朱丹溪逝世的那一年（1358）。因此這兩位在當時各領風騷的重要人物，就在此短暫的空間交會中，各自又展開自己不同的生命旅程。

即便如此，當朱丹溪死後，戴原禮便開始整理朱丹溪遺稿，而最後完成《金匱鉤玄》這本書。並藉由這本書之問世而使得朱丹溪鬱說受到傳佈。而在此同時，劉基正也懷著大志難伸之感概於歸隱青田山期間開始撰寫《鬱離子》，因此在此時間之同步交會中，「鬱」之問題意識在朱丹溪·戴原禮·劉基三者間微妙地交集，並以不同之形式被推展開來。

二、劉基與朱丹溪學派

³⁴ 元·戴良在《九靈山房集·懷書樓寧詩》中寫道：「海日蒼涼兩鬢絲，異鄉漂泊已多時。欲為散水留官道，故托長桑說上池。蜀客著書人豈識，韓公賣藥世偏知。道途同是傷心者，只合相關賦黍離」。這首詩就是對滑氏的生涯與情感的最佳寫照。

由於朱丹溪及其門人弟子大多出身儒門，因此朱丹溪學派與當時金華地區的文人名士的交往相當密切。其中如宋濂、戴良等人與朱丹溪、戴原禮於師承或親緣上都有相當深厚的關係。尤其為朱丹溪寫墓誌銘及傳之兩位大學者宋濂·戴良於至正十九年(1359 朱丹溪死後一年)被朱元璋延攬為「五經師」及「學正」，而隔年宋濂與劉基又被朱元璋召至南京為門客。由此可見劉基與宋濂·戴良等人在此期間應該有很密切之接觸。

當然第一章中已經大略提到，宋濂曾經為求學於許謙之朱子學而從游於朱丹溪，且朱丹溪母系家學中又有呂祖謙之學脈傳承，因此朱丹溪的存在對宋濂而言其不僅是儒學之前輩，其更代表著元代浙江金華儒學的代言者。職是之故，當宋濂與劉基交友之際，對於朱丹溪這號重要人物的介紹及討論是不可能不提及的。³⁵甚至在一項朱丹溪的醫學文獻《丹溪醫按》之紀錄中，似乎可以看到朱丹溪與劉基有直接會面的可能。

伯溫年近四十餘歲，滋味厚，素患嗽疾。可與通神丸、神脾丸、和勻，食前以薑湯下五六十九。後以津咽小胃丹十粒，日服六服。³⁶

在中國的歷史社會中，劉基常以劉伯溫的稱號聞名³⁷。引文中朱丹溪所提到之「伯溫」雖然可能另有它指，但也不能排除就是指涉著劉伯溫，也就是劉基本人。尤其根據朱丹溪此《丹溪醫按》之其中內容來看，朱丹溪對於年少的友人患者，習慣以其字號稱而記載之。且此患者年近「四十餘歲」，若將之比對於劉基年表³⁸：

至正十一年辛卯(1351)四十一歲 仍寓居杭州，至年底。其時徐壽輝兵鋒直指饒州、信州，基慮時局有變，從杭歸里。

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四十二歲 省檄為浙東元帥府都事，自里返杭。復又從杭赴台州、溫州一帶參與戎事。《行狀》：“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元帥納鄰哈刺謀筑慶元等城，賊不敢犯。

所述內容來看，劉基四十一歲時因思時局有變，故曾從杭州南歸故里處州青田以避時亂。而隔年四十二歲時又從青田回到杭州接任元帥府都事，之後又再次南下至台州·溫州等處參與戎事。由此可知劉基於四十一、二歲時前前後後往返於杭州青田之間至少二次，而在地理位置上朱丹溪所居金華府又是介於杭州與處州之間的轉驛站，因此在劉基

³⁵ 除此之外，基於戴良與劉基的兄長滑壽有所往來，從而間接推斷，劉基也有可能經由戴良的〈丹溪翁傳〉而接觸到朱丹溪醫學。

³⁶ 朱丹溪《丹溪醫按》(前揭書《丹溪逸書》所收)咳嗽第七p. 19。

³⁷ 例如明代名醫蕭京在其醫書中提到劉基劉伯溫《鬱離子》的內容，以表明其對當下庸醫害人無數之警嘆。「考昔劉伯溫公言曰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燦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價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幹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邊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少矣。而獨我也乎。此伯溫公憤世嫉邪之言也今醫者既外以售柑矣而病者可愚瞽而受戮乎。」參見明·蕭京《軒岐救正論》卷之六〈病鑑〉。

³⁸ 林家驪點校〈劉基年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1999年)p. 651。

的旅途中，劉基路經金華而順道拜訪朱丹溪不無可能。此在劉基的詩文的內容中亦可以得到佐證。劉基於〈至婺州聞官軍自溫處之江東所過皆空遂從間道還鄉〉中提到：

聞道人家總避軍，我亦獨穿豺虎群。莫思身外路多棘，且喜雨晴山出云。林端石磴鵝自占，澗底風松猿共聞。他年想像或夢到，兩鬢白雪應紛紛。

由詩名及內容來看，此詩就是記載劉基欲還鄉青田(當時介於溫州·處州之間而屬於處州)時，路經婺州(金華)的心境。由此看來，劉基於此時路經金華拜訪於朱丹溪的推論就更加可能。尤其前已述及，劉基生來身體多疾，因此朱丹溪所提到伯溫「滋味厚，素患嗽疾」之記載，此與劉基衣食不缺，卻素患疾病的情況有所吻合。

前引文中所提到之伯溫病例，朱丹溪將之列於「咳嗽」項目之中，而在此項目之後緊接著就是關於「吐血」的記載。在此項目內容中，關於「吐血」朱丹溪有如下之描述。

台州林德芳年三十余歲，得嗽而咯血，發熱，肌體漸瘦。眾醫以補藥調治數年，其病愈甚。予診其脈，六脈皆澀。予曰：此因好色而多怒，精血耗少，又因補寒太過，榮衛不行，瘀血內積，肺氣壅遏不能以降內。肺壅非吐不可，精血耗少非補不可，唯倒倉法二者俱備，但使吐多于補耳。兼灸肺俞五次而愈。³⁹

其中因「得嗽而咯血」「多怒」「肺氣壅遏」之病症描述若與《行狀》中記載劉基因軍功不錄事件(四十三歲左右)，委屈含怨而「發憤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中略)因有痰氣疾。」的內容相較，亦可看出其中病症之關聯性。

亦即劉基若於四十二歲以前未得咳嗽之素疾，四十三歲時大致上不會一時因事有不遂發怒之後，便造成吐血之嚴重現象，而此現象之後又導致劉基罹患痰氣病(氣鬱)而於四十九歲時辭官歸里寫下《鬱離子》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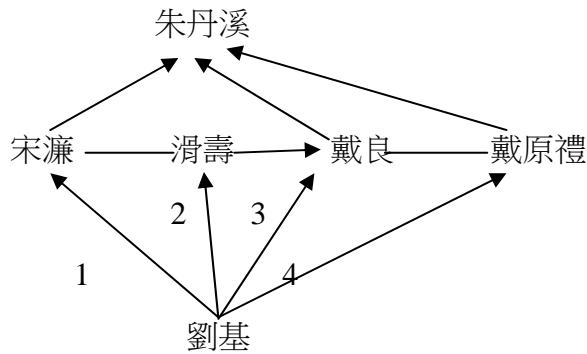
由此從而間接可以得知，朱丹溪於《丹溪醫按》中所提及之「伯溫」此位患者，相當可能即是劉基本人。

另一方面，當朱丹溪死後戴原禮於至正十九年(1359)時開始懸壺吳中。由於其得有朱丹溪親傳之醫學，所以醫名大噪一時。且因其與宋濂之關係密切，因而有可能受到宋濂之薦舉而于洪武七年(1374)蒙朱元璋召見。

入宮時戴原禮以其醫術及人格受到朱元璋之敬重，一度獲賜太醫院一職。然戴原禮無意官宦生涯，婉辭而歸。然而就因為這段入京的過程，促使戴原禮與同在朝中的劉基

³⁹ 朱丹溪《丹溪醫按》(前揭書『丹溪逸書』所收)吐血第八p. 19。

之間有了進一步的接觸。⁴⁰從而朱丹溪醫學中之六鬱說亦可能在這個時期經由戴原禮的介紹而傳佈給身患氣鬱病的劉基。



由上圖可見，而這個綿密之人脈網絡中，劉基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對朱丹溪的思想也有所瞭解。而朱丹溪《格致餘論》中的重要理論亦有可能經由這些人的討論而傳入劉基之耳中。因此，朱丹溪學派中對「鬱」之重視，是否引起了劉基之興趣而間接地將之反應至《鬱離子》裡面，頗值得玩味。

針對這個推論，筆者先行針對《鬱離子》中的記載，分析其是否與朱丹溪學派的醫學思想有所回應，以為確認兩者間的互動有無。首先就《鬱離子》中論理性較強的〈天裂地動〉中的內容來看：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道幽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有餘未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地以之奠，今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夫震掉顛惕，而不為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既不為跳躍奮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繇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在水，其動也繇乎水，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非陰有餘也。

劉基於文章開頭中所提到的「《傳》」，其中所指者即是〈洪範五行傳論〉⁴¹。關於《傳》中「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之概念，劉基提出了部份修正，而結論出「天裂陽不足：地動亦陽不足」之說法。且不論此說法之是否正確，劉基在《鬱離子》中提

⁴⁰ 劉基文集有〈送醫戴原禮歸金華〉之詩文，應該就是在這個時期起筆的。同上書《劉基集》〈送醫戴原禮歸金華〉。

⁴¹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強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參見劉向《漢書》卷 26〈天文志〉。

出「陽不足，陰有餘」之說法，似乎與朱丹溪《格致餘論》中有名的「陽有餘而陰不足論」的討論議題有所類似。唯不同的是在有餘與不足的說法上兩者之間有相當的差異。至於劉基為何在《鬱離子》中突兀地選擇了這個題材呢？其理由可能在於朱丹溪對傳統精義的不同解讀上。

比如說，第三章第二節中發現到，朱丹溪的五行排列方式原先具有採用了洪範五行的說法之傾向，但是後來又因朱丹溪最終選擇了仿效《易》傳取象於天的方式；因而對原本遵循的洪範五行排列又做了一次調整。於是在這種新的舉動之下，其說法一出便引起了當時學者的注意，而促使朱丹溪於《格致餘論·天氣屬金論》中不得不特別提出說明以證成自己的五行觀。

另外於第四章研究中亦可得知，《金匱鉤玄》六鬱說一問世，便有弟子王履等人著《醫經溯回集》之五鬱說而與六鬱說對抗，乃至明代名醫李時珍·張介賓等人，一方面接受朱丹溪部份新理論，一方面又針對其新理論部份提出反駁以建立己說。這也就說明了朱丹溪或戴原禮的作法往往與傳統思想有所出入，因而造成當時或後世學者之質疑而一一提出理論應該回歸原點的訴求。

同樣地劉基於文章開頭便提出〈洪範五行傳論〉「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這樣的說法，這個作法是否可以看作為對朱丹溪〈陽有餘陰不足論〉的一種間接回應，值得深入探討。首先就劉基之論點來看：

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地以之奠，今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夫震掉顛惕，而不為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既不為跳躍奮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繇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在水，其動也繇乎水，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非陰有餘也。

其以「舟水之關係」以證成天道運行乃「天裂陽不足：地動亦陽不足，而非陰有餘」這樣的結論。而若一旦此理論成立的話，其「閃電打雷之天裂之現象乃陽不足」之說法，與朱丹溪相火論中「天之龍雷」乃「陽有餘」之概念，多少有點理論上之衝突。因此，劉基此篇論述是否是針對朱丹溪「陽有餘陰不足」論點而激發出的思想上的論證，此點有待進一步查證。

當然劉基所論者乃據天地之氣多寡而應用到對自然現象之說明，此種論述與朱丹溪之關心點多少還是有所差異。因而兩文之間雖然都特別突出陰陽的過剩與不足之問題，但探討對象及焦點不同，暫時還不能將兩者之間關係作太多之連想。倒是其中有一篇〈去

蠹〉篇則有較明顯的足跡可尋。

郁離子疾，病氣菹痰結，將設之，或曰：痰，榮也，是養人者也。人無榮則中乾，中乾則死，弗可設也。郁離子曰：吁，吾子過哉！吾聞夫養人者津也，醫家者所謂榮也，今而化為痰，是榮賊也，則非養人者也。夫天之生人，參地而為三，為其能贊化育也，一朝而化為賊，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是故俞跗、扁鵲之為醫也，浣胃滌腸，絕去病根，而阡死者生。舜、禹、成湯、周文王之為君也，誅四凶，戮防風，剿昆吾，放夏桀，戡黎，伐崇，而天下之亂載寧。其將容諸乎？容之無益，以戕人也。故蟲果生也，蟲成而果潰，自我而離焉。非我已，其能養我乎？弗去，是殖賊以待戕也。從子之教，吾其不遠潰矣。

文中劉基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概念，那就是「病氣菹痰結」。此句話中其實有兩種概念，也就是「氣菹」與「痰結」。其中「氣菹」的「菹」亦同於「蘊」，也與「鬱」同義。因此「氣菹」也就是「氣鬱」的意思。而「痰結」主要是痰聚積成塊之意。

在朱丹溪鬱說出現以前，除了與劉基有地緣關係的永嘉醫派（宋·陳無擇）有注意到「氣鬱」的概念之外，其它醫派卻咸少提起。而朱丹溪也因受永嘉醫派的影響，對於氣病的問題特別關注且在此基礎上另立新說。尤其其中將「氣鬱」與「痰結」的概念聯結使用的方式，可說是朱丹溪獨特的論證方法⁴²。如《格致餘論·養老論》記載：

內虛胃熱則易饑而思食，脾弱難化則食已再飽，陰虛難降則氣鬱而成痰。⁴³

由此可知，朱丹溪的鬱說思想可能在元末時期，經由其《格致餘論》(1347)的傳播而傳達給劉基；或者是說，〈去蠹〉篇可能是劉基于仕明期間遇到戴原禮之後，所創作的作品。也就是說，劉基因著自己的親身經驗及心理感受，將當時流行的丹溪醫學的語言直接放入《鬱離子》中。若此推論正確的話，這篇文章的出現是目前證明丹溪醫學確實影響到了當時文化界的最佳證據。⁴⁴

以下，再就《鬱離子》中與「鬱」相關的幾項內容，作進一步的探討。

三、《鬱離子》中「鬱」之相關視野

於上一節引用的〈去蠹〉篇中有「氣鬱」的記載。同時，吾人亦在同書中發現到另

⁴² 請參考《格致餘論》之〈治病必求其本論〉、〈養老論〉、〈痰癘論〉、〈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等諸篇內容。朱丹溪《格致餘論》（收錄于田思勝等主編《朱丹溪醫學全書》，2006）。

⁴³ 同上書《格致餘論·養老論》，p9。

⁴⁴ 據此，本文得以更加相信《鬱離子》這本書不僅最為政治學上的讀本，其在醫學、心理、人類社會學的研究上應該也能提供現代人鬱病研究的一些線索。

一個丹溪學派不曾使用的語言—瘧。「瘧」這個字在《鬱離子》中出現了兩次，一次是在〈戚之次且〉篇中：

昔周之姪冶子早喪其父，政屬於家僮，沸用賄，於是家日迫，將改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僮群詢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況於疏遠之人乎？憂之何補，祇自瘧也。

另一次是出現在〈玄豹〉之八：

梓謂棘曰：爾何為乎修修而不揚，櫛櫛而無所容，幽糝於灌莽之中，翳朽籜而不見太陽，不已瘧乎？

在〈戚之次且〉篇中，「瘧」是因為「憂」所造成的；而〈玄豹〉中的「瘧」亦有幽藏於灌木朽木間而不見陽光，從而引申出罹患「瘧」的敘述。從這兩個敘述看來，中國思想傳統上，將心情憂愁而幽禁閉塞不出的現象看成「瘧」。而這個字又與陰濕不見陽光而產生的「霉」的音義上有所相通，因此這另我們聯想到歷史上另一個很貼切的例子。亦即歐陽修政爭失敗後退隱鄉里，在其閒居之期一直受幽憂之疾所擾，面對這個疾病歐陽修於《歐陽修文集》送楊真序中提到：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即學琴于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行，久則樂之愉然，不知疾之在體矣

此中所提到的「幽憂之疾」的敘述，正是「幽藏不出」與「憂愁」兩者意義的結合解釋。從而吾人得以經由《鬱離子》瞭解到，「幽憂之疾」在中國南方醫學來看，就稱之為「瘧」。

而由於《鬱離子》中同時分別使用了「氣鬱」與「瘧」的語言，這也就說明了在當時的社會中，同時流行著兩種不同指涉意義的類似概念出現。當然追究其原因，即如上述所提及者；那是因為朱丹溪鬱說的出現，才造成了傳統「幽憂之疾」之外，又有了另一種新醫學理論的出現。而究竟「氣鬱」理論與「幽憂之疾」的「瘧」有何不同呢？資再借葉蕃《寫情集序》（洪武十三年）中對劉基的描述以為說明。

或憤其言之不聽，或鬱乎志之弗舒

由「言之不聽」「志之弗舒」得以看出，劉基所罹患的病，不是如「瘧」般，消極的居室不出，憂愁滿面的現象。相反地，當時劉基的心理狀態是非常積極進取、欲求改變的。只是因為事與願違，所以在忠言與大志無法推展之下，才導致憤鬱之身心失去平衡的現象。在第二章中討論到朱丹溪〈相火論〉中憤鬱現象與：

又《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膹鬱病痿屬於肺，火之升也。

《格致餘論·相火論》

此中「諸氣膹鬱」說明了劉基的憤鬱現象導致了肺火的升起。而肺火的升起過甚，就戴原禮的解釋來看：

故鬱者燥淫為病之別稱也。燥乃陽明秋金之位、化經曰⁴⁵、金木者生成之終始...生之重殺之輕、則氣殫散而不收。殺之重、生之輕、則氣斂澀而不通、是謂鬱矣。⁴⁶

在醫學上「燥」之「陽明秋金」之位，在五臟而言即是相應于肺。因此燥淫所指即是肺火過旺之意。而肺火過旺則會造成肝的生發之氣受阻而氣鬱。因此由此推論出，入明時劉基所得之病，比較偏向朱丹溪學派所言之氣鬱病。且由葉蕃的序文及劉基性格的分析來看，這種氣鬱病往往是因為理想性過高，而不能接受現實的實況所引起的一種高尚的鬱病。

因此此種類型的鬱病，類似朱丹溪的診斷中因怒而鬱的論證模式。而這個論證模式，最後經過了明末名醫張介賓的分類，便有了「怒鬱」的說法；至於剛剛提起的「痿」的病症的類型，就朱丹溪及後來張介賓的理解，則應該就是被歸納為「憂鬱」的範疇之中。⁴⁷

當然憂鬱與怒鬱之間的區別，有時並非單純以現象的觀察便得以截然區分的。因為其依著個人的身心狀況不同而有所不同。有時甚至憂怒現象會有次第出現的情況。因此有時必須從脈的診察中去掌握實情了。⁴⁸如《格致餘論·瀆脈論》

東陽吳子方年五十，形肥味厚，且多憂怒，脈常沉瀆，自春來得痰氣病，醫認為虛寒，率與燥熱香竄之劑。至四月間，兩足弱，氣上衝，飲食減，召我治之。予曰：此熱鬱而脾虛，痿厥之證作矣。

根據朱丹溪之說法，憂怒兩種情緒反覆出現時最終會導致痰氣病之產生而有痿厥之病狀。而綜觀前述《明史》、《鬱離子》、《寫情集》中之記載，劉基本人的確也都具有憂怒、痰氣、痿厥之現象。因此整體來看，劉基早期的儒家淑世態度與入明之後韜光晦影的道家傾向，此正也呈現出劉基於面對自己早期的怒鬱乃至晚期的憂鬱時，如何藉由於

⁴⁵ 化經即指唐末宋初與呂洞賓、陳搏齊名之道士譚景昇所著之《化書》。

⁴⁶ 參見戴原禮《論治準繩》卷四。

⁴⁷ 朱丹溪亦明確地使用了「憂鬱」這個說法。「人之所藉以為生者，血與氣也。或因憂鬱，或因厚味，或因無汗，或因補劑，氣騰血沸，清化為濁，老痰宿飲，膠固雜糅，脈道阻瀆，不能自行，亦見瀆狀」。《格致餘論》〈瀆脈論〉。

⁴⁸ 如朱丹溪有如下之診脈資料記載：「東陽吳子方年五十，形肥味厚，且多憂怒，脈常沉瀆，自春來得痰氣病」同上書〈瀆脈論〉。

《鬱離子》之書寫以吸收聖賢的智慧及自我轉化，從而安頓其自身所面對的苦難。這樣的過程，是劉基《鬱離子》留給現代人面對鬱病時很重要的「意義治療」學問。

四、欲望與禮教之反思

除此之外，劉基對女性的人權問題也呈顯出相當大的同情。比如說，他在〈寫情集〉的詞句中對女性的心情有特別細膩的描寫：

問青青，河畔草。能得幾時好。春去難留，鏡掩鸞空老。淒涼深夜黃昏，新愁陳恨，趁風雨、一起來。霧雲杳。漫有千丈遊詩，那堪繫殘照。羅幕寒生，哽咽子規叫。斷腸只是緣愁，柔腸數寸，怎禁得、許多煩惱。〈寫情集祝英台近〉

這是一篇描寫少女，感嘆時光流逝、憂情難耐的愁緒。而下一篇則是等待夫君來歸、了了無期的婦人心情。

白日墮林端，庭宇生寒。黃蘆風急一雁來難。階下露珠眉下淚，相賽沈瀾。寂寞掩重關。坐到更闌。月華雖好不堪看。舊恨新愁都有幾，地窄天寬。〈浪淘沙·閨怨〉

品味這兩首詞的內容，不難發現劉基不但具有嚴肅的儒家性格之外，還蘊藏者對女性現實困境的真切理解。因此經由劉基對女性感情的關懷的解析之後，吾人再來審視《鬱離子》中對「婦人七出」的記述內容，將會對劉基此段說話有更深一層的感受：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夫之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以夫者，淫也、妒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為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婦人七出」之說乃源自於《大戴禮記》⁴⁹。而劉基針對這個說法而提出了他的看法。劉基身為儒者基本上對於禮法乃持正面之看法。但對於其中有違人性自然發展之處，劉基亦義無反顧地予以批判。如「惡疾」「無子」本非婦人本身所能決定，故休而去之實非仁義。因此劉基反問「婦以夫為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這句話即是對禮記以來，尤其朱子學派所強調的「存天理去人欲」之說所提出的一個反擊。

然而《鬱離子》中所提出的觀點並未完全被注意到。尤其明初朱元璋建國初期為求

⁴⁹ 參見《大戴禮·本命》「婦有七出。不顧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國家穩定，接受了朱子學為正統國學而對於婦女所應遵守的道德禮法更加要求。比如說朱元璋曾經下令戰死士兵之婦女不准改嫁而要全部集中在寡婦營。劉基認為這樣的作法有違人性，所以對朱元璋說道：「士卒物故者，其妻悉處別營，凡數萬人，陰氣鬱結。」⁵⁰而奏請朱元璋更改律條。

劉基雖非醫生，但其認為將戰死士兵的妻子集中在寡婦營中限制其再出嫁。這樣的作法將導致積怨之陰氣鬱結而對社稷不利。由此得以看出，劉基對於當時婦女之人權不被重視之情況勇敢地提出建言，並且他以「鬱結」之概念來說服朱元璋。當然對於這種因政治或社會因素而使夫婦長期分離，導致婦女的健康受到威脅的現象，於朱丹溪之醫案文獻中亦有類似記載：

一女許嫁后、夫經商二年不歸、因不食、因臥如痴無他病、多向裏床睡。朱診之、肝脈弦出寸口、曰：此思想氣結也、藥難獨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脾主思、過思則脾氣結而不食、怒屬肝木、木能克土、怒則氣升發、而沖開脾氣矣。令激之大怒而哭、至三時許、令慰解之、與藥一服、即索粥而食矣。朱曰：思氣雖解、必得喜、則庶不在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愈。⁵¹

婦女許嫁後丈夫長年在外，正常的夫妻性生活無法滿足，乃至於思想氣結而困臥如痴。此亦是顯現出婦女的情慾未能適當之宣洩而最終鬱鬱寡歡而得病的案例。而前面亦已討論過褚澄治師尼寡婦之病時亦提到，「師尼寡婦，獨居怨曠，獨陰而無陽，欲心屢萌而不適其欲，(中略)久久成癆瘵矣。」因此朱丹溪對此情慾不遂而致鬱結之現象，亦有相當之瞭解及同情。

另外除了政治及社會變遷因素導致婦女致鬱而病之外，⁵²身為朱子學派之一元，朱丹溪首度以醫師之身份，紀錄了一份禮法與醫病關係的文獻。

金氏婦壯年，暑月赴筵歸，乃姑詢其坐次失序，遂赧然自愧，因成此病，言語失倫，其中文多問一句曰，奴奴不是。脈皆數而弦。余曰：此非邪乃病也。但與補脾清熱導痰，數日當自安。其家不信，邀數巫者噴水而呪之，旬餘而死。

⁵⁰ 參見《明史》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⁵¹ 明·江瓘《名醫類案》〈丹溪醫案〉(中國中醫出版社, 1996), p 46。

⁵² 由此看來，不論劉基《寫情集》中描述的婦女思夫情愁、以及《鬱離子》中所提出的不當「罷妻」風氣的不人道思想，乃至政治律條中的寡婦規管所造成的「陰氣鬱結」，這些問題皆有可能反映出朱丹溪醫案中描述的思想氣結問題。而這種思想氣結的論證，發展到了明末則被分類為「思鬱」的醫學學說。從而「思鬱」與前述之「怒鬱」、「憂鬱」形成有名的情志三鬱說。

朱丹溪認為禮之用意乃在防五害。因此他相當重視禮法之價值，甚至參考朱子家禮而教導子孫。但在上引文的記載中，金氏婦女因不熟悉禮法而座次失序。結果導致婦人受責羞愧而言語失倫，最後又因錯誤治療而導致婦人死亡。朱丹溪面對此項案例雖有責備婦人之家人相信巫術而延誤治療的含意，但是朱丹溪身為禮學的擁護者，能夠坦然地於《格致餘論》中公開這個案例。說明了朱丹溪意識到了禮法的實踐對人心乃至健康亦可能造成某種程度之負面影響。

這個文獻可說是元儒中最早對朱子禮學所提出的第一個反思及警惕。而劉基是否也是因為在拜讀朱丹溪的鬱說理論之後，而在禮法與情慾的衝突之間，為婦女合理的情慾權力展開辯護，這是相當值得更進一步深究的課題。

肆、結 論

近年來，劉基學研究越來越興盛。而其中以其富有張力的政治生涯及因之而激發出的文學作品最受矚目。本文在這些前賢的歷史考據結果的基礎下，跨越政治、文學、心理學、哲學、醫學諸領域的門檻。以劉基自己的親身經驗，去解讀歷史中所留下的誤解及其《鬱離子》中留給後世的重要訊息。

誠如楊訥先生所研究般，劉基的確並非如〈行狀〉及《明史》所描述般被「羈管紹興」。但是經本文研究，劉基也並非如楊訥先生的說法般，為了躲避賊寇而遷居紹興。而其真正原因，乃是因為劉基因討賊不利而引疾辭官，最後才有舉家牽越之事。因此劉基在其憂國憂民情懷及雄心壯志屢次遭受到打擊，以及感受到時不我予的現實問題之下，終於促使了劉基決定歸隱青田，而著作《鬱離子》。

因此，《鬱離子》的書名的意義並非僅是洪武十八出版的序文所說般，象徵著「文明的昌盛」。而是一種意義深遠而多義性的存在。經本文從劉基的生平及詩文的比較研究，發現到了《鬱離子》這本書包含了劉基仕明之後所增寫的新內容，而這些內容更是反應了劉基矛盾心理的無力感及對朝中權臣間的權利爭鬥所產生的無奈情緒。

而這種情緒正反應出當時一些有心扶正的士人儒士的心境。劉基站在「仕」與「隱」之間。以其堅決的勇氣及智慧，經歷了一段朝代更替及建制的過渡時期。但也因其間重重的矛盾，致時以解開民鬱為志的劉基，最終亦難逃身心交悴、鬱病纏身之苦。

因此若以民本思想來解讀《鬱離子》的話，將可清楚看到，這本書的主軸一直圍繞在如何解人民之鬱的課題之上。而劉基站在這個中心點，去看待政治、社會、文化甚至婦權的問題，並且從中尋求去憂解鬱的方法。因此從思想史角度來看，《鬱離子》是《呂氏春秋·達鬱》篇思想的展開與實踐。

而劉基以其自身的苦難，企求換取君德下行、民心上通的和諧狀況。但是事與願違，於是劉基便如朱丹溪鬱說所說般，由於上下不和，所以居於中者先受其鬱了。因此若從此角度來看，〈行狀〉及《鬱離子》序文作者們，無須刻意隱藏劉基脆弱的一面以求後人的崇拜。反而因為我們真實呈現劉基為民而鬱的一面，如此更能顯現出其脆弱中的偉大。

因此在這樣的解讀下，我們發現到《鬱離子》中提供了現代人面臨現實困境的安處之道的可能。他以他自身的生命，經歷「怒鬱」到「憂鬱」的過程。並將這些走過的過程，藉由寓言故事，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除此之外，他超越了身體場域的侷限，將其關懷觸角延伸到女性人權問題上。經由劉基細膩的體察，原本以為只是夫婦間的家庭小事，卻也可被反應為禮教文化與政治、社會活動間，糾纏不清的哲學性課題。《鬱離子》的出現，正是為這樣問題產生，試啼先聲。

當然根據本研究之結果顯示，雖然還無法百分之百足夠證明劉基受朱丹溪鬱說影響而有此鬱離子之作。但就劉基對氣鬱心瘳等醫學概念之使用，足以說明劉基與朱丹溪同時感受到當時社會普遍存在之鬱之問題。尤其劉基在書中反對朱子「婦人七出」之說及「寡婦營」之策，正也反映出劉基對於欲望與禮法間之衝突問題與朱丹溪之理論有共同之關懷。

或許由此亦可看出，兩者之觀點突顯出了隸屬於強調事功的永嘉學派之劉基，與參和著金華呂祖謙學術思想的朱丹溪，共同地對南宋以來朱子禮學之盛行之一種反思。這種反思雖然各自以醫學及文學之方式表達，但是兩者所呈現對朱子學中「天理人欲」之過度強調所造成之社會問題之關懷，正也反映出當時社會接納朱子理學後，對於所謂憂鬱病之產生有推波助瀾之可能。

然而即便劉基與朱丹溪皆反省到政治文化上之禮法與人類本能慾望之間的確存在著矛盾衝突。但兩位士人並非因這種矛盾衝突的出現而斷然否定禮法存在之重要性，亦即他們瞭解到合理的慾望順遂可以「文明昌盛」，而不合理的慾望壓制則會造成「鬱病」的產生。這個合理性就是他們所追求的「合乎人性的禮」。因此「鬱離」與「欲禮」該如何合理調適而致中和，這便牽涉到儒家或道家所提倡的工夫論的問題了。這個問題將另闢篇幅討論。

參考文獻

1. 楊訥《劉基事蹟考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
2. 黃伯生〈故誠意伯劉公行狀〉張廷玉等編《明史·劉基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739年。
3. 王立群《尋找理想國—劉伯溫政治寓言集：「郁離子」白話版》，遠流出版社，1994年。
4. 吳淡如《鬱離子寓言研究》，台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89年。
5. 車行健〈劉基《鬱離子》探論〉收錄於《書目季刊》三十一卷，四期。
6. 參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清順治刊本。
7. 劉基《少微唱和集》。
8. 侯外廬主編《方以智全書》通雅二十，姓名。
9. 唐·司馬貞撰《史記索隱》三十卷。
10. 林家驪《劉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
11. 朱丹溪《格致餘論》，收錄于田思勝等主編《朱丹溪醫學全書》，2006年。
12. 戴原禮《論治準繩》。
13. 明·江瓘《名醫類案》〈丹溪醫案〉，中國中醫出版社，1996年。

